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论坛

会议记录（未经编辑版）

时间： 2012 年 11 月 1 日下午 2:00-5:40

地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主办方：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

主持人（王丰）：大家下午好！我是王丰，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们中心也是今天下午这个活动的两个主办单位之一，另外一个主办单位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有好几位复旦大学的同事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

今天要谈论的问题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在中国经过了 30 年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过去 10 年人均 GDP 增加了 4 倍的史无前例的 10 年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怎么样再往前走，实行下一步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及社会整合，一个经常提到的概念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今天下午论坛的题目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非常多位知名学者和知名的媒体人士。我们的讨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由我主持，茶歇之后进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讨论下一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在这之前，我想大家都有很多问题，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谈论很多的词，哪些原因会造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讲，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会是什么？有哪些政策的选择可以实行？

第一部分主要是讨论经济增长下一步的经济转型模式，参加讨论的人有胡永泰博士，他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也是复旦大学教授及好几所大学的教

授，知名国际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他是中欧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我们还请到了刚来北京不久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女士，复旦大学教授陈钊老师。

同时还有两本已经出来的书，是两本同样的书，一本英文、中本中文，同样的标题，在我们的报告厅外面提供给大家，如果大家想带一本书回去，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咨询。胡永泰教授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所以下面我们给他 26 分钟来作个介绍性的发言，余下的嘉宾每人大概 18 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提问、讨论。

有请胡永泰教授，欢迎。

胡永泰：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是我们复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研究的结果，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看全球的历史的话，大家会发现过去对未来一个非常好的预测，我们会问一下，在 2012 年之前持续增长 35 年的国家是哪个？今天这个国家怎么样？答案就是，在 1912 年之前，它要比第二位的国家增长速度快一倍。我们看今天这个国家怎么样呢？我想起一首歌，《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尽快看一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中国经济未来要怎么样持续发展下去。

我想，“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追上了全球的经济领袖。换句话说，这个国家能够和全球的经济领袖相比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实现了全球经济领袖的人民那样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看各个地区不同的国家，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相似性，在大部分地区，除了中东和东亚以外，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看 CPU 指数，也就是国家的生活水平除以美国的收入水平，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是全球的经济领袖，在过去的 150 年一直是全球的经济领袖。我们如果将它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高收入主要是指美欧国家，低收入主要是拉美国家，我们会发现 55% 是高收入，20% 是低收入。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值改变 5% 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多大的变化，通过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中国在 2005 年开始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现在中国的增长趋势怎样？我们认为是收入不断整合。在西欧、南非和欧洲，我们看西欧，在上世纪 60 年代，80%/20% 是一个区分，这样的一个区分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短，在上世纪 60 年代，20 个国家是高收入，到 2008 年是 27 个

国家。美国人比欧洲人的工作时间要长，而且美国人的人口年龄要比欧洲人低很多。如果我们看拉美，拉美是“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最频繁的地方，我们看在拉美收入最好的五个国家，最开始是 20%、80% 的美国的水平，平均数是 30% 左右。但是虽然时间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基本上变成一样了，平均值是 30%。

那么，中国未来将成为哪个国家的模式呢？我们来看几个东亚发展最快的国家的经历。马来西亚从美国 80% 的水平到 30% 的水平，现在到了拉美的水平。在上世纪 60 年代第二个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是泰国。中国从 1982 年超过了印度，1992 年超过了菲律宾，2000 年超过印度尼西亚，中国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一样，超过了周边国家，现在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家。中国会不会像马来西亚那样持续发展下去？我们需要将期望调到最低才能更高兴。

我们用马来西亚和台湾省相比，和韩国、和日本相比，我们会发现，马来西亚在开始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但现在的增长非常快，马来西亚现在比上世纪 60 年代的台湾省和韩国要富裕很多。但是马来西亚从 2001 年出现了持续的间歇性经济增长滞后，这就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的例子。

另外，像韩国、台湾和日本，他们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70% 的水平。

在我们的书中有三个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追赶的幅度很难能够保持下去，因为就像做一个工作，经常做、反复做，很难能够实现非常持续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因为增长的不同阶段需要面对不同的困难。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马来西亚遇到了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会失败。

另外一点就是国内政策必须和国际经济环境相适应，现在全球经济下滑，以出口导向的政策比以前更加不可靠了。

刚才比喻中国是一辆快速的汽车，那么，这个汽车如果出问题，会是什么原因？会有三类问题导致这辆汽车出问题。第一种是轱辘掉了，就比如是国内的经济机制出问题了。第二是软件出问题，比如这辆车内部的人打了起来，比如中国出现了政府无力、政府腐败，导致人民的不满，使得社会出现不稳定，这些不稳定会影响到投资，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这是两个在文献中举的非常多的例子。我想强调的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供电的问题，比如汽车没有油了，或者车撞到了其他人设置的路障。这第三个问题就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需要一个国家要寻找一个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这个问题是无法自己解决的。因此你要问一下，中国共产党认

为现在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中国共产党在 2006 年认为我们的软件是最可能滞后中国经济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口号，也就是说，让中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来努力。

但是，在我们这本书当中，现在我们讲这三个出现问题的原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首先我想引用托尔斯泰的书中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用数学怎么来表达这句话？我们列个公式（见图），

$Y=X_0+aX_1+bX_2+cX_3$ ， Y 是幸福水平， X 是有出现的问题，如果 X 是 0，就是指你解决了出现的问题。我想，托尔斯泰想讲的真正的意思是第二个公式， $Y=X_0 \times aX_1 \times bX_2 \times cX_3$ ，相互之间是乘法的关系，只要任何一个 X 是 0，幸福指数就是 0。清华大学是理工科的大学，大家对这样的公式应该不陌生，我们应该能够很好地理解。

由这个问题我们引出下一个问题，即政策力竭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有整体的方式来谈我们的政策。

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模式呢？我们的书谈到了相关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需求管理”的理念。大家可以看到 2008 年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2012 年 GDP 趋缓，这是一个需求管理的很好的例子。

我们还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过程的策略，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应该减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比如在户口、在土地、在农村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都需要加以很好地解决。

另外一个就是养老金体系，我们需要增加有效的养老金体系，使这个资金来源的体制更加有持续性，这是一个有效的支柱。

金融体系也是重要的缓解，要促进中小私有银行进一步发展，人口政策方面要进一步修订独生子女政策，还要改善城市环境管理政策。像环境、人口，就属于“电力供应”这类问题，也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另外还有硬件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些建议都包含在以上提到的三种问题当中，即硬件、软件和“电力供应”。

关于治理能力，如果治理跟不上，人们对于政策的不满情绪也会提升，我们列出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赶超其他国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需要有效和妥善地处理。

除了不安定因素，人们对于政府的期待还在提升，比如对于教育、对于出行等等。

除此以外还有贫困收入的问题，贫穷状况增加，收入分配有恶化趋势。

在这样一些问题影响之下，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采取新的措施、新的模式。我们也知道，2006年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相关的政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下面看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知道，过去台湾和韩国等国家成功地外贸驱动模式实现了转型，在过去10年当中，中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增长。我们也看到，中小企业并没有像国企那样出现非常大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来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因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在WTO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多方谈判的推进，同时进一步减少进口限制，还应该更好地管理好人民币，更加灵活地进行管理。这些措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行，特别是面对欧洲和美国经济趋缓、趋于停滞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同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到外交关系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应该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好面临的问题。

我们已经提出和谐社会，实际上我把和谐社会的理论进一步国际化，要把它扩大到“和谐世界”的概念。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更好地处理好它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谢谢胡教授精彩的开场讲演，他对大家谈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作了很准确的定义，也把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体很形象地比喻为一辆汽车，同时讲硬件、软件和外部动力的问题。

具体讲到中国经济现在有哪些机会和风险、经济怎样才能持续发展，我们请到许小年教授来讲。许老师不是本书的作者之一，但我们今天论坛的长处之一就是我们能够请到一些外边的学者来讨论这个很重要的题目。下面有请许老师。

许小年：胡老师和研究团队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正当其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我是同意胡老师的判断，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很有可能像马来西亚那样陷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

这个陷阱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去打破这个陷阱？我谈一下我自己的思路。

目前世界上谈“中国模式”谈得很多，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有两个，不止一个，世界上所谈的，特别是外界所谈的“中国模式”就指的是东亚模式，就是强势政府干预经济、拉动GDP的增长，实际上就是东亚模式，但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并不是遵循中亚模式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1978年到90年代中期

(1993、1994年)，我把它叫做第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邓小平模式，邓小平模式不是东亚模式，它是斯密模式，是国退民进，让市场发挥更多的资源配置的作用。这种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一直到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从斯密模式转向新古典模式，也就是索罗(音)教授所指出的新古典模式，它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新古典的增长模式纯粹依靠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投资的增加，来驱动增长。而斯密模式(邓小平模式)不是靠单纯的追加资源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它依靠效率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也就是90年代中期以前，效率提高的来源是国有经济的缩小，资源从国有部门转移出来，配置到私营部门，提高效率。我们都应该知道，私人部门配置效率是比国有部门高的，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我们都可以说明。

另外一个资源的转移就是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高效的农业和商业部门。

前半段的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中的激励机制，私有化的推行以及绩效工资的采用，在基层上改变了人们的激励机制。因此，前半段的中国模式和斯密模式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之上的GDP增长，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东亚模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完全依靠投入的增加来驱动增长。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它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会有一个增长模式的转换？我们简单地讲，就是从一个好的增长模式转换成了一个坏的增长模式。当然经济学上用“好”和“坏”判断是难以说明问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模式转换？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改革是依赖现有的官僚体系从上而下地推动。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官僚体系可以是open up的，它通过放的方式，让资源在经济中比较自由地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这部分资源自由流动所产生的效率逐渐耗尽，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时候，这个官僚体系就变成了“看得见的手”。过去这个

“看得见的手”也在这儿，但是它在前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是逐渐往后退的，让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达到了平缓期的时候，这只“看得见的手”就过来取而代之，由它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我们看到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大，政府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我说的政府包括国有部门。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是国进民退，资源的配置发生了不利于效率提高的变化，是从民营部门转向了国有部门。之所以在这种逆向的配置情况下经济还可以维持高增长，完全是因为政府的投入大大增加。90年代中期，我们的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0%左右或多一些，到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了50%，大大提高，通过大量的投入。

正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是依靠投资、投入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困扰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压力就是各行各业大量的过剩产能，哪个行业不过剩？全都过剩。

这样的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新古典增长模式的一个表现，它不是原因，并不是说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再也上不去了，而是因为在这个模式下，在东亚模式下、在新古典模式下，这个收入是不可能上去的。

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就决定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很方便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在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只有形之手刚开始是帮助经济增长，目前它越来越变成掠夺之手，哈佛教授史莱弗有本书就叫做《掠夺之手》。在对经济干预的过程中发现，它的干预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越来越强。从动机上来讲，越来越从鼓励增长转变为寻租。现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这两个动机都有，但我们的感觉是寻租的重要性在加强。

如果我们上面的这个逻辑推理和观察能够成立的话，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不在政策，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因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框架下，政策的改善仅仅是延长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寿命，而不可能把经济从新古典模式再转换到亚当斯密模式上，不可能再转换到邓小平模式上，不可能再转换到依靠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使用量的增加这样一个增长模式上去。为了实现这个增长模式的转换，必须推进全面的制度改革。谈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我觉得只是延长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寿命，而不能够实现模式的转换。要实现模式的转换，要把我们关注的重点从政策转向制度。

当我们从政策转向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亚洲各国、拉美各国普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再强调一遍，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结果，只是一个增长模式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的还是集权的，都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原因在哪里？我认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法治。当然我这里只是一个假说，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与法治密切相关。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法治上去的突破，它就可以依托市场经济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法治比较好的国家，比如日本，它确实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韩国，在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司法独立的环境中，它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日本随后又陷入了“高等收入陷阱”。刚才胡教授的图表显示出，日本和美国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高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坎儿是法治，过不去了，而“高等收入陷阱”陷在什么地方了？个人的创造力。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回到斯密所定义的角色上来，让市场、让个人发挥作用，也就是创新。日本经济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创新不足。包括新加坡，新加坡也是“高等收入陷阱”，创新不足，它和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政策，而是制度，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从经济学转向起码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从理论研究上来说，才能够打破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随着国进民退，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益强化，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会阻碍制度方面的变革。现有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状态对这个利益集团是最优状态，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管制来造租，然后再到市场上来寻租。再改革下去，就会影响到他们造租的能力，从而影响寻租的能力。因此，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的问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许小年教授。因为许教授三点还要参加另外的会议，要离开我们的会场，所以我把讨论的部分往前挪一下，就许小年教授和胡永泰教授刚才的发言，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我们先进行讨论，然后再进行发言。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许老师。您刚才说从政策转向制度，并且建立法治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您强调政府寻租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政府即使想这么做，有

可能在做的过程中丧失政府所创造的秩序和稳定性。您也强调法治，政府想让步的话，怎么把这个过程实现？这个步骤具体应该怎么做？

许小年：我想，我们在大学做研究，应该少一点功利主义。学术研究，起码我是很不愿意提供政策，很不愿意提供答案的，因为我没有。我只能说，现在你要想依靠政府来继续推动改革，这个动力我看不到。如果政府是唯一的改革的推动力量的话，结论就非常明显，就是我们会沿着新古典的增长模式继续走下去，一直到产生危机那一天。其实这个危机在哪些地方可以产生？我觉得胡教授的书里也都写到了，比如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比如银行体系的坏帐，比如财政，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几个可能要出问题的地方。但是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也就少花点时间在预测上。

提问：我想问胡教授，你觉得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在减少您刚才讲的软件失败的效果怎样？您觉得它们是一种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刚才您解决的软件问题吗？

胡永泰：我想，全球改善政府执政的经验是什么？如果要政府越来越具有责任，运营越来越高效率，如果想让政府负起责任，人们需要有一个机制，让有能力的人走到上面去，那些没有能力的官员被迫离开，比如选举，更多地使用自由的媒体，让公众在选举的时候做出选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做法。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客观的机制，自由选举、自由媒体和自由地发表观点。当我们看外面这些国家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都在看中国会不会遵守这些国际法，如果想遵守这些国际法，问题是，这个国家如果不遵守自己的国内法的话，有多大的可能会遵守国际法呢？执法就更成问题了。许教授讲的问题是新古典增长机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用我的话说就是这个软件无法推动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发挥职能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中国，因为中国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意味着全世界出现问题。同样，一个和谐的世界需要一个和谐的中国。像哥本哈根峰会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逐渐崛起的大国，如果一个国家想说“不”的话，需要展示出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你说的是而只是给予一个否定答案的话，我想，中国的机构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能够担负起一个有责任的大国的职能。

王丰：胡教授发表完演讲之后我就问他，你要把中国的和谐推向世界，要媒体自由，那么是不是也有对媒体的监控和拦截？我理解，胡教授讲的“和谐”是在一个框架下的和谐，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和谐”。因为大家也了解，在中国，如果什么事情不让说，就说这个事情被“和谐”掉了。

提问：我是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教授余安（音），请问许教授，您刚才讲我们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坎儿是法治，我想请问，您的依据是什么？是理论的推理还是有经验的证明？因为在我看来，至少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法治最典型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它的民事和商事法律，而民事、商事法律最主要的特征是形式平等，形式平等法治的加强一定会加剧经济的不平等，这就可以看到经济与社会的冲突在这里会非常明显。如果要继续社会权的话，社会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策而不是靠传统的法治。今年还有来个现象，一个是中国颁布 82 宪法 30 周年，如果您认为这个法治是靠宪政的改革为幸，请听您的高见。如果你认为现在是司法独立，现在我们的三个诉讼法全部都在改革，有两个已经完成，您认为这是走向独立还是没有走向独立的体现？

许小年：有一些理论上的依据，就是法律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我们在经济学院都教的，也就是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基础的这一套理论。为什么要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才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展开讲制度经济学。

中国的现状，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工作，确实我们都在做。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在强制法治方面最关键的是两个工作，一个是司法的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个执法是无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法院、我们有法律，都得不到执行。宪法可以再修改，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不会很关心宪法的修改，为什么？我知道已有的宪法都不能够执行。现在我有没有表达我自己思想的自由？没有，说把你的什么文章封掉就封掉了，尽管宪法保护我的言论自由，但是在现实中根本保证不了。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现在这些纸面的立法将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如果要讲司法改革的话，我想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司法独立，第二个建议是禁止行政立法，由人大收回所有的立法权，禁止政府行政部门立法。行政部门的立法直接和执法联在一起，因此现在立法成了寻租的工具，把我部门利益做到法律里去，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我再寻租。这样一种状况，这个法治是开玩笑。你写的宪法修正案写得越多，越伤害你自己的信用，人家越不信你，因为你给人家去做纸面文章。一个法治社会，从构架上来说，一定是三权分立的，一定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分立的。如果不分立的话，这个法律体系没有执行力，我们现在不是法不够，是法的执行力不够。

法是什么？法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法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是国民的法治观念，如果全体国民有法治观念，这个法才能够管用，如果国民都没有法治观念，那一定是潜规则。比如政府要发一个牌照，我不去送礼就拿不到牌照，不送礼的就一定吃亏。一定要所有人都牢牢建立起这个概念，拿牌照是靠自己的竞争力，不是靠送礼，这个法治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法治不仅仅是学者修改宪法，法治不仅仅是政府在那儿喊法治的口号，法治也不是老百姓良好的愿望，都要变成人们的观念。这就是涉及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制度？青木昌彦（音）的定义非常好，制度就是共有的信念，才构成制度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共有信念，宪法再出多少稿也没用。拉美国家的宪法全是照抄美国的，怎么样？法治的建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一天两天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提问：许小年老师您好，我叫李达（音），是清华经管学院的MBA。现在社会上仿佛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去年清华代表团也访问了墨西哥，我们回顾世界这20年来，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民主化事件就是2000年时墨西哥诞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也告别了70多年的一党专政。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发现这个社会仍然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大家仍然在抱怨贫富差距，仍然在抱怨国有企业的垄断，仿佛这个国家除了为世界贡献了一位首富以外没有任何贡献。

许小年：你没有明白我说的上一个问题，什么叫制度？民主作为一个制度，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共有信念。青木昌彦出了一本书，我认为所有的研究生都应该读，他讲制度讲得非常好。如果法治和民主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共有信念，哪怕你建立起民主来了，你在印度建立民主，你在菲律宾建立民主，你在马来西亚建立民主，但是你去观察一下，它的民主和美国民主、和欧洲民主是不一样的，它的国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与美欧国家的国民也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民主不是写在纸上

的，真正的民主并不止是只有一个选票，真正的民主是法治是每个人脑子里如何理解这个民主，真正的法治是每个人脑子里如何理解法治，是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如果你对墨西哥的法治不满意，你可以去研究墨西哥法律的独立性，马上可以发现它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别。如果你对它的民主制度不满意，你去看看它的老百姓对民主是如何理解的。你现在可以去台湾看一看，早期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如何从两条烟、一壶酒就可以买一张选票，过渡到今天，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在走向成熟，去看一看。我不认为民主和法治是包治百病，但是我认为，没有民主和法治，“中等收入陷阱”很难打破。

主持人：谢谢许老师。

在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除了在座诸位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起草、发布的《中国 2030》。这个报告也指出了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很多问题，所以今天作为讨论的一部分，我们很有幸请到了不久前到任的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女士，她将给我们讲一下《中国 2030》报告和中国的情况。

吴卓瑾：大家下午好，我中文的程度很差，所以请包涵我，我得用英文说。

首先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重大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中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对我个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我也从这本书和各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作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角色，《中国 2030》这篇报告中所讲的主要观点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中的观点是非常相近的。

胡教授和他的团队在书中提出了非常雄辩的例子，提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和建议，并提出他们的建议，这点非常重要。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个报告有 700 多页，两个月之后会在网上发布，大家到时也可以去下载。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在过去 30 年中的发展。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主要的研究成果。当然，我并不是今天下午发布的书的作者之一，实际上，我们这篇报告是和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专家学者共同做

的，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刚刚到任，所以我也仅就自己所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篇报告，当然其中有很多专家学者应该是更适合的，因为他们更了解情况。

我们的报告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调整政府的职责和角色，并使私营部门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来发展。看看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在私有部门、私有企业中的情况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越来越少，劳动效率有所提升，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型企业越来越多。当然这些私有部门、私有企业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因此它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我们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应该创造一种促进创新的大环境。中国正在逐步成为高收入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拥有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技能的劳动者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像生态环境一样的大环境来促进创新。

第三，我们还需要绿色发展的途径。

第四，我们过去在很多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发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机会的公平以及基本的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

第五，我们建议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财政体系，使它和政府的政府更加贴近、更加适合。

这些报告中发现的成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想谈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对世界施加了很大的影响，竞争力出现了很大的提升。但比较优先的部门或战略性部门还是国有企业占了垄断地位。

当然我们在报告中也谈到了如何能够给这些垄断行业引入更大的竞争，以便它们能够得到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改革政府的治理，这样才能促进更多的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让私营企业有更多的发展，发挥它们的作用。

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财务体系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的改革，国有银行的作用应该重新进行调整。我们在《中国 2030》这篇报告中对此加以论述。

从组织建构来讲，一会儿陆铭和陈钊将给大家介绍，我们在报告中突出了土地改革的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改革。因为我们知道，土地对于地方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报告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聚焦在政府职责的改变方面。

接下来还花了很多的篇幅论述促进创新环境的建设，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在研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GDP中的比例非常大。大家可以看看日本、韩国或台湾过去25年的经验，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这个过程比台湾、韩国的创新还要早，投入大量精力在创新中，可是这个投入收回的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也讨论了相关的原因以及政策建议，这样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全球创新和研发网络的作用。

我们还谈到了知识产权保护，所谓中国原创的发明创造是非常少的，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于跨国公司，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以及法律体制的建设，以便能推动中国在国际创新链条中的作用。

在谈到发展、谈到生产效率时，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在产品质量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和拉美是非常相近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促进创新的环境，需要提升管理知识创新的能力，这样就产生了很多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领域，随着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要看到，不仅仅需要财政的资源，政府已经投入了很多，占了GDP很大的部分。

除此以外，中国还需要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创新的环境，这是我们的报告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专利保护情况，在美国的专利注册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跨国公司。我们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做得更多？如果看看台湾，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创新都是真正原创的创新，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韩国和台湾的情况一样，有很多非常原创的创新，都在美国申请了专利，可是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注册的中国专利基本上都是跨国公司申请的，当然这些申请人都是华人，但他们都是在跨国公司的平台上做出来的。对于世界银行来说，实际上我们贷款的90%都进入到了促进创新的领域中，比如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因此我们在《中国2030》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是论述环境的，也就是“走一条绿色之路”的话题。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过去的20年中，在贫困方面还有许多问题，脚步可能有点放缓，这些差距是存在很大的挑战性的，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在一些地方做了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但是还没有取得可以推广的成果，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挑战。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展进程。

还有是财务系统。大家知道，财务系统进行了四级改革。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湖北、上海会不会成为改革的重点？随着财务系统改革的推进，其有效性能否进一步提升？还有待于观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关注了财政投入效率能否得到提升的问题。

关于财政体系的问题，《中国 2030》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关注的问题是比较相近的。实际上，财政体系政策的改革也是我们报告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另外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和谐社会的理念，特别是谈到地区间差异、收入差异的时候，它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它也涉及到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体系及其与相关的社会环境挑战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等。

银行改革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世界的发展也相当重要。我们研究了如何能够给中国提出更多的建议，在伙伴关系的投资方面给中国提出很多建议，使中国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

另外，报告还谈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

这就是我们未来五年的战略，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吴女士用这么短的时间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厚的报告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刚才一位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都能够看出很多问题，但是到底谁能够做这个事情？许老师刚才说，作为学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是拿工资、拿这个收入的人来做。刚才吴卓瑾女士介绍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会在这几方面起到促进作用，这也是一个答案。

第一阶段最后一位发言人是陈钊老师，他要讲的就是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讲到的，如何在软件和软件方面继续延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化。

陈钊：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最根本的背后就是制度，所以是既有政策又有制度。

我们要说的是要有新的城市化制度，首先来看一下老的城市化制度是什么样的。

现有的城市化战略思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两方面的控制，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来控制，二是通过土地制度来控制。

第一，与户籍制度有关的控制是控制城市化的速度，“十二五”规划时有这样一个定位，到2015年，城市化的比例要从现在的47.5%上升到51.5%的水平。这个五年计划，除以5会发现，年均增长点不到1%，是慢于现有的增长速度。根据国际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左右，超过50%以后，应该是步入一个加快城市化的阶段。所以我们对于城市化速度的规划是比较保守的，是一个控制的态度。

同时，不仅控制城市化的速度，还控制城市的规模。同样是在“十二五”规划里，我们要控制特大人口的规模，并且要管理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对于中小城市，根据实际情况，有条件地来放松、放宽户籍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控制特大城市增长的思路。

第二，在土地市场方面。通过土地指标来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因为中央政府有18亿亩耕地的红线，所以每年可以用于转化成非农业用地的现有农业用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政府把这个数量划拨到每个省，每个省可以有多少“农转非”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不允许跨省交易的。由于东部沿海地区拿到的这个指标和其发展速度相比是不够的，又不允许指标之间的相互交易，事实上就限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当然就会限制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

从现有制度来看，是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两大为抓手为核心来控制城市化的模式。这是不是一个合理做法呢？我们应不应该去控制大城市呢？书中作了比较研究，在此简单讲一下。

书中把上海、北京、广州和东京圈、纽约做了比较。以上海+苏州为例，因为上海-苏州的面积是和日本东京圈的概念差不多的，在最面积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比较这两个区域的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发现上海+苏州和东京圈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如果往未来看，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取决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轻型化、随着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城市需要的人口密度是会提高的。

另外，城市对于人口的承载也和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关。

从这两方面来看，不管是现有的产业结构特征还是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上海应该比东京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为我们现在的水平还不够。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大城市的未来发展应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而不应该现在就采取控制的思路。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多了呢？如果我们把 3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称为大城市，100 万-300 万人口的城市称为中小城市的话，在 2000 年，全球大城市是 94，中等城市是 324，比例是 0.29。中国大城市是 10 个，中等城市是 84 个，比例是 0.12，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城市在数量上并没有太多。即使到 2009 年，这个比例也只有 0.17，上升了。这是一个规律，但是还没有达到 2000 年时全球的水平。所以，我们的大城市在数量上看并不多。

是不是我们这些并不多的大城市的规模比人家大呢？事实上发现，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大。如果我们用城市人口空间的基尼系数来度量城市规模空间差异的话，和基尼系数是一个概念，这个基尼系数越大，就表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和小城市的规模之间的差异越大。全球是 0.56，日本的城市是 0.66，而中国只有 0.42。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城市并不大，小城市并不小。这说明，事实上我们恐怕不应该有控制大城市的思路。

如果你要问，是不是我们可能通过控制大城市，依靠中小城市的发展，就能解决我们的效率问题、发展问题了呢？首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主要靠的是东部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还是中小城市的企业？恐怕还是要依靠大城市的企业。我们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来看区域性的城市发展和它周围的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我们以 1990 年时人口达到 100 万这样一个标准来界定区域性大城市，然后来看周围的中小城市和它的距离（横坐标）对中小城市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和大城市非常近作为参照，发现你离它越远，你的增长率越低。这就说明，中小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大城市去发展，事实上这是一个城市的体系，中小城市的发展要依赖于大城市，如果你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控制大城市的效率、控制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中小城市恐怕也是不利的。所以，限制大城市，指望依靠中小城市的发展思路恐怕是行不通的。

我们再看户口和土地控制到底有什么结果。在我们设计的图表中，横坐标是在初始年份时每个城市大学生的比例，纵坐标是在 1982-2000 年期间大学生数量的上升速度。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人往高处走”，哪个地方的大学生越多、人力资本含量越高，这个地方越发达，高技能的人就会往那

里跑。但是这里有比较突出的点，一个是上海，更夸张的那个就是北京。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户口的限制，可能这些大城市还认为我通过户口、通过打分，就要留住高端人才，其实户籍制度反而限制了相当多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些人如果没有户口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而农民工们如果没有户口，也可以来打工，这对于城市发展反而是不利的。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实证研究，都是关于户口和幸福感的研究。我们发现，对于没有户口的、受过高教育程度的外地人来讲，当他看到收入扩大的时候，实际上他不高兴的。因为收入扩大对于幸福感有两种影响，一种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了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未来的收入也能上升呢？这是一种示范效应。还有一种是攀比效应，如果我没有机会变成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扩大只会让我不高兴。而对于没有户口的外地人来讲，他的机会是不够的，他是没法跻身于这个高收入里去的，这种变化是让他不高兴的。

我们对于户口和信任水平的研究发现，其他东西都一样的话，没有户口的人更不信任周围的人、更不信任政府，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还是这样。所以，如果不解决户口，哪怕外地人收入提高了，也是会带来不信任的。以上海的数据我们还发现，没有户口的人倾向于住在一起，当然我们的肤色是一样的，但是在美就是黑人和白人居住区分割，我们这里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居住区分割，这对于城市治理是有不利影响的。

陆老师曾经有一个户口和消费的研究，结果发现，没有户口，其他都一样，显著降低你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户籍还影响到我们的内需。

对于土地，总的来说是建城区面积的扩张速度，一个是非农人口面积的扩张速度，这两个速度是有差异的，人口扩张要慢于建城区的扩张。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土地的、空间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但这背后是个效率损失，土地利用效率是低的。而这种低，在西部地区是最明显的，这个比例差异是最大的。如果我们限制东部地区，这种扭曲会使得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越高对于土地的利用反而是低效率的。

总结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城市化政策。我们总结了三个方面，它应该是市场化导向的对资源进行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配置。现在有些人认为东部地区不一定要发展，产业转移从200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但我们自己的实证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确实

在 2000 年中期以后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产业转移，但这种转移既有从东部到内地，也有从内地到沿海。事实上对于企业最有吸引力，最让他们留在当地的原因是当地的市场规模。而我们知道，在短期里，中国的市场潜力主要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给定这一点，你是不可能去扭转这个趋势的。

其次，要发挥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应该建立一个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因为户籍制度导致要素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是有成本的，土地的使用也是有指标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体系空间布局是不协调的，是有所扭曲的，这样就会有效率损失，东部地区的效率集聚效应不能重新发挥，反过来对内地、对中小城市也是不利的。

这样一种新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作用来实现平衡。这个话听上去好像有点奇怪，政府之所以要进行人口控制、土地控制，就是怕东部沿海地区太发展了，怕经济失衡，我们为什么反而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看怎么去理解这个平衡。我们认为，这个平衡不应该是经济规模总量意义上的平衡，如果中国每个省、每个城市都一样大，这个平衡一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每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历史条件、自然地理条件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分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总量的平衡更有意义，更有意义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首先是人均 GDP，然后是人均实际收入，最后是人均实际生活水平、幸福程度、生活质量等，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平衡。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虽然经济规模很大，内地的经济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人均生活质量很好，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结果。

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东部地区的市场潜力还是最重要的吸引企业的因素，因此东部的经济集聚并没有被扭转，经济的集聚还是在东部，但同时我们对劳动力的要素流动是有限制的，内部的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享受到经济集聚的好处，而被滞留在内地，在农业上面，使得农业不能现代化。这种政策看上去是为了实现平衡，实际反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失衡，所以就应该把它扭转过来，这是我们概括提出的对于新的城市化政策的思考。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陈钊教授。

下面请各位听众对以上三位发言人的讲演进行提问和讨论。

提问：我有个问题请问胡永泰教授，像埃及，埃及有很多软件的问题，但是他们在经济增长中引入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政党下台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提问：胡教授，我向您请教一下。您在发言中提到马来西亚的例子，马来西亚现在确实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以您的观察，应该如何解释？

第二，请问陈钊博士，您刚才对当前的城市化战略有一些批评，请问您如何评价最近五六年一些省份都采取的推动城市之间相互合作的政策？像省内高新区，有很多这样的创意，比如湖北省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包括像安徽皖江开发，也涉及到行政区域划分改变的问题。对这些推动新的城市化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的措施，您如何评价？

提问：请问陈钊老师，您说到产业转移是双向的，能否举一个例子，什么样的产业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第二，您谈到劳动力的转移是受到限制的。其实，最近两三年中西部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是高的，而且由于经济放缓，东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放慢，有很多农民宁愿待在中西部离家里比较近的地方也不愿意到东部地区去打工，从这个观点上来讲，户籍并不是限制农民工流动的因素，您对此怎么看？

提问：请问陈钊博士，您的研究中对于城市化的概念主要是从户籍方面做考虑，但除了户籍以外，现在的城市化指标更多的是考虑城市化的质量问题。关于数字的增长，北京大学专门研究城市化的周教授也做过预测，他说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在0.9-1，这是很正常的，但这也属于对数字的预测。请问您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数字增长的因素之外，在城市化的质量方面有什么考虑？国家对于城市化的速度限制，您刚才提到是考虑到怕东部地区过快发展，因为国家对于各个地区城市化的指标是没有限制的，而是从土地使用的角度进行整体的综合考虑，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陈钊：关于产业转移，我们的研究发现是双方面都有，从内地转向中东部沿海的主要是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产业。

关于民工工资的事，您谈到民工更愿意在中西部。但我想说，这恰恰说明户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因为户籍制度没改革，他们在城市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所以他们才会到老家去找工作。也恰恰是因为土地指标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土地指标不够，地价上涨，成本上升，所以有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才会去内地，所以民工才会就近就业，这恰恰是土地和户籍制度限制的结果，而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不利于东部的集聚效应在市场规律下的进一步发挥。

关于城市化的定义，当然是用常住人口来作。您刚才讲到数量和质量，和前一个问题有关，事实上我们确实非常强调市民化，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怎么样市民化呢？非常复杂，很重要的一点是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能不能均等化地享受。我们的初步建议是，你直接给他户籍，短时间内做不到，只能给一小部分人，怎么办？就是公共服务水平的适度均等化。即使没有户籍，你也可以把一部分公共服务给他分享。城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当非户籍人口的服务服务水平与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接近的时候，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水到渠成了。当然需要一些配套性的改革，比如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差距太大的话，大城市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胡永泰：我先回答马来西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然后再谈谈埃及的问题。

实际上，从 70 年代开始，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革，对于华人有点歧视，在 7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华人经济，当时制定的主要政策，第一是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的企业变大之后，要放弃 $1/3$ 给政府，股份要平摊，要分配给马来人，也就是当你的企业增长以后，你要自然地失去 $1/3$ ，而事实上马来的企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增长，有很多钱离开了马来西亚。第二是马来西亚 20% 的大学都是华人任教。随着经济的流失，马来西亚的人才也流失了，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一个打开国门的国家，有很多外国资金进入到了马来西亚，外国工程师和外国的人才也进入了马来西亚。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要通过美国国会来获得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国会不允许的话，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比如海南岛飞机失事的时候，美国就停止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中国加入 WTO 之后，到马来西亚投资的跨国公司就是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的机遇更好。现在马来西亚的排华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中国，对于私营企业的歧视也会影响中国从

中等收入发展到高等收入的国家，这种歧视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看到这种挑战非常巨大。

埃及也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国家不改变它的软件环境的话，大家看到了，穆巴拉克这个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们问一下，人民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的软件环境？看一看这个变化发生之前的情况。我想这个答案是中期、短期和长期效应要分开讨论，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国王不愿意听从改革派的意见，法国革命就开始了。而英国则出现分权，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英国还保留了君主制，而法国的革命就比较彻底，这种改革也就要考虑到你的长期利益是什么。像台湾的例子，蒋介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主持人：第一部分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二部分：全面深化改革

主持人（杨燕青）：欢迎大家回来。

在全球和中国著名的王丰老师后面主持第二节的讨论，我觉得是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因为清华又是我特别仰慕的学府，同时我也认为布鲁金斯是全球最好的智库，几座大山压在我的头上，我觉得我颇为紧张。

因为这一节有非常好的几位演讲人在，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有两位非常资深的男士，他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中国最好的学者，还有看起来非常聪明也非常年轻的三位女士，所以我希望第二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不逊于第一部分的讨论成果。我看到在场的人比上一场稍微少一点，这不是坏事，实际上是一个好事，说明留下来的这些人是真正想参与我们的讨论的。

第一场讨论以后，有一些结论，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问题，我们第二部分的讨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部分讨论之后，我想提出“胡老师之迷”这样一个概念，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花很长时间来讨论的命题，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大家一直在围绕着讨论的话题。这让我们想起了两本书，也是在问类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成功，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看今天的中国，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两天，关注中国未来的人都会关注一个报纸，即《纽约时报》，前两天《纽约时报》有一篇非常重磅的报道，我也看了，但今天我才发现这个报道的作者我也认识，他是上海分社的社长，我和他在很多场合下一起讨论问题，今天5月份我们在摩根斯坦利的一个论坛上讨论中国的未来。当时观众提问说，你们两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还能继续推进吗？比如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当时这位作者的答案是，他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不会有推进。当时我的回答是，中国在非常的短期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就会推进。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刚刚采访了周小川，这是他说的。我们也看到没过几个月，中国就真正地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不过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记者，在他的稿子发表之后，有很多美国记者问我怎么看这个稿子，他最后的数字是不是真实的？我说，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背后的数据，所以我不能说“是”或“不是”。无论我们如何来评判这篇新闻，无论如何评判中国未来的现状，我们会有一个答案是所有人同意，而且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个答案应该是说中国必须要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聚在一起讨论第二部分的这个重大的改革，中国为什么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按照发言顺序，首先请中国社科院教授蔡昉老师，他会给我们聚焦于中国的人口挑战。我想，每个人都应该非常熟悉蔡老师，我也一直读他的书，对他非常佩服。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组织的研讨活动。记得在2007年蔡老师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他也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中国在2007年就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不知道时至今日蔡老师是否有新的想法和新的结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蔡老师。

蔡昉：大家下午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我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说中国有一种可能性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它应该是怎么造成的？简单地说，如何造就一个“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先看看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经济减速。也就是说，今年大家都看到了，到9月份为止，7.7%的GDP增长率。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周期现象，也许需求遇到了冲击。我接下来要从人口因素来谈，因此我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结构性的，或者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我们看看中国的人口因素如何将减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过去这些年，人们看到中国经历的最伟大的事情是 30 多年保持接近 10% 的增长率，还有人看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坚持一个独特的人口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你再深进一步看，更引人注目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当然有些我们称为“比较天真的人”用人口普查数去计算直接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量，从六普的数字看我们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 1.18，但是人口学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愿意用这个数，因此我们用学者们和一些权威机构预设的水平来假设目前的生育水平是 1.4。我们已经多年处在不仅是更替水平之下的生育率，而且也多年处在非常低的更替水平之下。我们搞人口的知道，官方有一个自己的所谓“均衡人口水平”，我们称它为 1.8。即使按这个水平看，我们也多年低于这个水平。1.4 是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大致和目前日本的生育水平一样。

多年处在低生育水平上，当然人口结构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是迄今（2010 年）为止，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处在不断升高的过程中。从 15-59 岁劳动人口计算出来的抚养比，把他们放在分母上，把其他两头依赖型人口作分子，一直处在下降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先不说“今”之后是什么样，按照一般的说法，通常的说法是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力是充足的，给我们带来比较多的储蓄。

具体来说，我们把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增长做一个分解，这接近 10% 的 GDP 是哪些因素做出的贡献。我不仅想说是哪些因素做出了贡献，而且还想说每一种因素中都体现着人口红利。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形成（投资），71%，看上去它是投资，是物质资本，但其实它是人口红利。理由有二：第一，我们过去一直处在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抚养比下降比较低，意味着我们的人口负担是轻的，因此我们有更多的剩余可以储蓄，这就造就目前我们的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有了高储蓄率才可以有资本积累。第二，我们学经济增长理论，大家都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你无限投入资本，就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但是我们有劳动红利，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长，因此我们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打破了这个假设，因此我们的资本报酬没有遇到低点现象，这样就保持了你可以靠投资、可以靠劳动投入。这是当年克鲁格曼（音）批判的模式，但是我们用这种模式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它的贡献是 71%。

劳动的贡献是 8%，这是人口红利。

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贡献了 4%，我们也知道，它和人口因素密切相关。

我们还可以把抚养比专门挑出来做一个解释变量，我们也发现它也对经济增长贡献了 7%，剩下的是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用另一个模型进一步分解，你会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这个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部门，本身就把资源配置得有效率了，如果说要素生产率如果贡献了 17% 的话，它占了 8% 的贡献。因此我们说，过去这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人口红利。

很显然，我们通常都说人口红利的一个标志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在增长，抚养比在下降。如果这个过程中断了的话，我们很自然会预期到一个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凑巧的是，刚才我说迄今为止是到 2010 年，到 2010 年，我们拿到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未来也会继续下降，而且会下降得越来越快。用这个数据做的抚养比，从 2010 年到达了谷底，然后开始上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不是将要丧失，而是已经丧失了。丧失的结果，我稍后说。在这里大家会问，我们通常都用 15 岁到 64 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为什么你为了说明人口红利消失就偷换了一个概念？我想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中国的退休年龄就是男 60 岁、女 55 岁，这已经定在那儿了；第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具有的受教育年限，我们不仅比发达国家水平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就越低，从 24 岁开始，到 64 岁的时候，人力资本降了 40%。也就是说，60 岁以后，无论从退休制度来讲还是从他们可能具有的市场所需要的技能来说，他们基本不再有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因此至少在这个阶段上，我们不能假设 60 岁以后的人还能作为劳动力有效供给。

我们还要做一个假设，你不能假设未来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还像过去那么快，原因是什么呢？无论是你们的老师还是学者、我们的同事的计算都发现，其实从 90 年代，我们的资本边界回报率已经在下降，在过去这几年里下降的速度就更快了，当然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新古典的一些假设现在开始发生作用了。刚才杨燕青说，我曾提到 2007 年就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其实我更倾向于说是 2004 年，到现在已经 8 年了，我们已经超过刘易斯转折点 8 年了，因此我们说，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了，而是越来越具有新古典经济的特征，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你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不可能再无限地去投资

了，除非政府帮助你制造一些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制造一些人为的大项目让你再投资。因此我们会假设，今后就业是负增长，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要降一些，假设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基本的趋势不变，但是我们应该假设它的增长速度会大幅度下降，因为我们不再有疾风暴雨式的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了，因此资源配置效率其实是逐渐丧失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估算了一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 1978-1995 年这段时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 10.3%。1995 年-2009 年，潜在增长率是 9.8%。我们过去的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率是差不多的。但是从 2011 年开始，我们开始进入到“十二五”，“十二五”期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降到 7.2%，到“十三五”会进一步下降，降到 6.1%。大家会看到，我们想象中一个经济增长减速总应该是一个缓慢的减速，为什么会有个突然的减速？“十一五”实际增长达到了 11.2%，怎么到“十二五”一下子就降到了 7.2%？降了 4 个百分点，比较可怕。但是，有一些研究其实也表明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到某一个发展阶段上，有人说 7000 美元，有人说 17000 美元，反正总有一天它会减速，会减几个百分点，这是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人口转折点，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增到减，从正到负，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因此体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上。

有人说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一些条件，我们需要犯错误，才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我这是做一些假设，我要回答的是我们如何才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犯一些错误，才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样的错误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犯着这样的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人微言轻，可能我们的错误还不足够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当我们说中国潜在增长率要下降的时候，当我们说今年一下跌到 7.7% 的时候，学者们通常会说，你应该下大力气，我们还有城市化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城市化会创造巨大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还有人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会超前，因此它也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因素。这是我们这些人通常告诉社会、告诉决策者的。

决策者也容易跟我们一拍即合，因为决策者手里有一些抓手，可以实施你的这些建议。比如我们过去搞的，尽管那时候不是为今天服务的，我们搞产业政策，十大振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我们有区域发展政策，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还有 2009 年试验非常成功的，至少很多人认为成功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等等，这些都可以实施学者的建议，都可以见到 GDP 百分点。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就要成立。

这里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当你讲潜在增长率要下降的时候，其实你讲的是供给方的因素，也就是说，我的生产要素可能性、我的生产率的提高幅度能够保证我们未来有一个正常的增长速度。但是学者的建议，加上政府的杠杆搁在那儿，它想用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它所尝试的是超越潜在增长率，因此就会实施很多政策。但是我觉得，这些政策已经显现了一些错误，比如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制造业、石油制造业、有色金属等产业，都是我们要鼓励发展，甚至给补贴、用各种战略性扶助方式去支持的产业，这就是产业政策如果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而不是靠市场来引导、不是靠企业自己试做的话，第一个造成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当然我们也知道，更容易产生的是通货膨胀，甚至还有日本式的泡沫，等等。

还有，推动中西部发展是好事，但是如果政府引导的、资本密集型的投资过多，也可能会犯一个错误，过去也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知道，中西部地区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应该说是劳动力更丰富、资本更稀缺的，但是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在中西部地区的水平绝对高过沿海地区了。也就是说，你推行这样的政策过度的话，可以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偏离比较优势，这是两个可能产生错误的地方。

因此，我个人对日本经济的理解，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日本 1990 年以后丧失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合理的，但是日本经济学家、政界始终会认为日本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因此他们把所有刺激需求的政策手段都要上演一遍，把各种凯恩斯主义的版本都来试验一下，结果反而在 80 年代后期造成泡沫越来越大，直至随着人口抚养比例的下降、停滞，到上升，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从 9.2% 高速增长，降到 3.8%，一直到过去 20 年的零增长。

刚才我说的结论应该这样总结，潜在增长率既定，你不应该用人为的政策刺激，特别是需求的手段去超越它，超越它犯错误的概率就非常大，你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更近一步。但是我们也不是宿命的，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潜在增长率是供给方的因素，供给方要素的保障是可以改善的，生产率是可以加快提高的，因此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我们强调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当年克鲁格曼（音）批评东亚模式的时候就是说你只有资本和劳动的增长，没有

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因此你不是奇迹，而且也不可能持续。但是他没有说对，因为他不懂人口红利。但是，当我们的人口红利没有了的时候，克鲁格曼的警告应该给我们以启示，应该看看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提高。

当然，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技术进步，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我们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了，当然科技进步会相对难一些，但不怎么说，我们是未富先老，我们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和技术前沿的距离还是很大。假设瑞士的科技是世界前沿的话，中国与瑞士的距离相当大，我们还有后发优势，我们要抓住它。

接下来我主要想说的是从配置效率的角度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将要进行哪些改革。

我们过去大规模的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是因为劳动力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这是典型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只有二元经济国家才有资格用这个机制，当你的剩余劳动力没那么多的时候，这个可能性就少了。但是还有，一个产业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仍然有生产率的差别，如果你清除了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的流动障碍，让谁该进入、谁该退出，这里就涉及改革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做到这一点，你的生产率还可以得到提高，仍然也叫配置效率。再进一步，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也是有差别的，如果没有企业歧视的话，没有说哪些企业不给它批准，哪些企业不允许它退出，要给它保护，直到它成为僵尸，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资源仍然可以在企业之间流动，该死的死，该升的升，该扩大的扩大，该兼并的兼并，你仍然可以获得这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我还是想强调，传统的人口红利还是有潜力可挖。世界银行有一个作者叫卡拉斯，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他建议了很多要改革的领域，但是他有一句话结论，我们觉得太悲观了，他说，这些改革没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会见效的。我们也想，我们一届政府、一届党中央、一届党委才五年，两届才十年，如果不能马上见到效果，还是缺少改革的激励。因此我们中国特色的改革，我把户籍制度的改革叫做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家想一想，因为现在大规模农民工进城，1.6亿人，构成了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1%，但是这些人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因此我们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重只有35%，这中间巨大的差别要靠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改革的话，农民工没有当地户口，就不能得到更好的社会保护，他的劳动力供给就不是充分稳定的。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城镇登记失业率在过去 10 年里是 4%-4.3%，大多数年份在 4.1%。如果我们计算一个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是多少的话，我们发现它是 4%-4.1% 之间。也就是说，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自然失业率。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登记失业的时候是不包括农民工的，只是本地市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居民因为人力资本、因为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他还要承受 4.1% 左右的自然失业，但是他们通常不承受周期性失业。2009 年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登记失业率也仅仅短暂地升到了 4.3%。谁承受了周期性失业呢？农民工，他不进入到你的等级事业统计中，但是当你不需要他的时候，你就请他回乡了，返乡潮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可以把农民工的供给加以稳定，劳动力供给潜力就提高了，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改革户籍制度就等于加大了吸引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激励，因此他还会继续转移，还能贡献一部分从一产到非农产业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第三，因为你是通过扩大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获得的这样一个增长源泉，它们也是一个好的收入改善的结果，因此他也从消费需求方为经济增长提供需求因素，因此你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更平衡的增长。所以我叫一石三鸟、立竿见影。这是我们同未来发展阶段要达到的那些国家比，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高 10%-20%，因此还是有潜力。

最后，有的学者做了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别仍然比较大，美国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比我们低，如果我们达到美国的标准的话，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30%-50%，也可以说产业内部的行业之间，也可以说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只要清除了制度障碍，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非公有经济等等，你做到这一点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可以给你带来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潜在增长率还是可以提高的。

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超越，超越了就犯错误，犯错误就构成了我们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政策条件。但是，不超越它还是有条件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这就保证中国长期、健康的持续增长，也实现了我们的主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蔡老师这样一个非常扎实的数据支撑的、结构非常完整、框架严谨的研究结果，同时还有非常多的政策建议。我想用一下主持人的便利，非常快地问蔡老师一个问题，请蔡老师非常快速地回答，然后再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

蔡老师给出了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如果说一个最大的坏消息的话，蔡老师说，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台阶了。我猜想，按照蔡老师的研究是按照人口的结构变化，2010年时，中国的总人口比进入了一个拐点。但如果我们看第二个关于人口红利的可能的度量的代理变量，有可能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在国外一般是19-64岁，在中国，蔡老师定义到59岁。如果按这个为拐点的话，可能是2015年。2008年全球发生了经济危机，给中国巨大的冲击。我的问题是，我们在2010年观察到的中国经济下台阶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一定在2010年中国就经济下台阶了？

蔡昉：第一，我不把从“十二五”开始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显著下降作为一个坏消息，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任何经济也不可能无限地在10%的速度上发展下去，因此很正常，也恰恰说明我们越来越接近一个成熟的经济。

第二，当然，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就是结构性的，是长期趋势，除非我们再遇到什么了不起的需求的冲击，甚至连这个速度都达不到的话，那当然是周期性的。

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数据，我们推算了，“十二五”的潜在增长率是7.2%，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要不要推动它，刺激它一下，让它快点，有没有必要？过去10年平均看下来，我们最终消费的需求对GDP的贡献是4.5%，投资是5.4%，出口是0.56%。我们做一个假设，出口不要了，0，行不行？投资必须要减一半，因为过去我们的刺激太多，大规模建设太多，不可持续，我们减一半，2.7%，加4.5%消费需求，正好是7.2%。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过度的刺激是危险的，而且显然是没必要的，我们现在更平衡的需求因素足以支撑我们的潜在增长率，7.2%对7.2%。

主持人：感谢蔡老师提供的另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研究。

关于中国的养老体系，这个话题是在第一个话题下的自然延伸，既然我们的人口结构变了，既然中国在逐渐变老，养老就变成了一个核心命题，下面我们要请来自复旦大学的两位才女，封进教授和何立新教授，首先有请何教授。

何立新：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发言主要是基于我们在胡永泰教授主编的书中的第一章，在本章中，我们是在城市化、老龄化和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讨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程，之后分析了主要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改革思路。今天我们着重讲其中的一部分思路，同时做一些补充。

中国现在有四大公共养老保险体系，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去年刚刚建立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我们分别列出这四大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主要内容，从覆盖对象来看，目前中国的公共养老体系可以说是覆盖了16岁以上城市和农村的非就业以及就业人。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可以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全覆盖。但是这个全覆盖其实是存在着公平性、参与激励不足等问题，今天我们也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展开谈。

我首先从收入分配效应的角度提出一些证据。像许小年老师说的，我们今天不讨论它的对策，只提出问题，提出一些证据，供大家思考这个公平性的问题。参与激励的问题，说后由封进教授来讨论。

虽然这四个制度从对象上来说实现了全覆盖，但是这四个制度的融资模式和养老待遇水平都非常不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个人以及用人单位都需要缴费，制度设计的养老金替代率是58.5%。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个人不需要缴费，替代率是个人退休前的工资比率，这个替代率比较高。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个人需要缴费，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养老金替代水平目前是每个月55元，再加上个人账户的一些养老金，但即使加上个人账户，现在每个月也最多是200元左右。

从这四种制度的设计和目前呈现状态来看，公民从养老制度中得到的纯收益是很不相同的。

比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最近十多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比企业养老金高1.5倍。这十几年以来，不管是机关的还是企业的，虽然它们的替代

率都呈现下降的过程，企业职工养老金比机关的稍稍低一点。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始终比机关的要低很多，这一年他们的替代率是47%左右，而机关事业单位是67%左右。

把家庭所缴的与养老相关的缴费剔除之后，看他们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里所得到的收益。最高收入组的纯收益比最低收入组的纯收益要高很多，从时间增加趋势来看，他们也是比低收益组要高。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存在着养老收入的逆向转移，这个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不同年龄段来分析，我们发现，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年龄段仍然是高收入者，得到的纯收益更多，也就是说，仍然存在着逆向收入的转移。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一点点累进。

以上数据是按年度数据来分析，而我们知道，养老保险的计算是要以终身收益来计算。年轻人是一个负收益，用他一生中从养老保险里得到的收益比他一生当中的工资收入，30多岁这一代系是个负向转移。从精算平衡的角度讲，年轻人适用这个保险制度是不合适的，从这个角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参与这个制度的积极性。

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分析进一步改革的时候需要去考虑如何发挥它的收入分配效应。

下面请封进教授来讲下一个问题。

封进：我们这章的名字叫“老龄化、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改革”。

大家知道，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家的改革方向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削减福利，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还是一个处在不断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在于比较低的劳动成本，这两个因素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可能跟别的国家还要有所不同的考虑，不仅仅是降低福利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有很多人没有被覆盖到，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这也是一个尝试，是我们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是一个普通现象，大部分人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养老保险。

你可能会问我，要怎么样把它扩大？因为从公平的角度讲，你应该让这些在同样的非农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有相同的待遇，在价值观上我们是一致的，但问题是怎麽扩大。这有两个问题，一是你向他扩大的时候，它是不是一

项福利？换句话说，缴费是由谁承担的。第二，如果这个缴费是由企业承担的，那么企业会不会淘费？这是我们想要说的一个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我们知道，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居世界最高之列，已经超出瑞典这类高福利国家。我们想，假如雇主给你交了20%的缴费率，到底有多少会以工资的形式转嫁给员工？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在转嫁的时候会根据人力资本区分，如果你是一个高人力资本的人，它的转嫁率就差一点，如果你是一个人力资本比较低的人，企业很容易找到替代你的人，所以也很容易把它的缴费转嫁给你。2002年的时候是很容易转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007年数据显示已经很难转嫁了，即便是对那些低人力资本的人，也很难转嫁，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在现行的制度约束下，劳动力供给还是很受约束的，低劳动力资本的供给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充裕了，所以企业很难转嫁。事实上企业交的那部分费率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相当于企业的成本确实由于养老保险缴费会增加。增加了之后，企业会不会逃费？因为逃费的现象也是确实被审计出来的，对北京、上海的审计发现，确实有70%以上的企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逃费。我们想看一下哪些企业会逃，我们也想看一下带有政策含义的变量，所以我们看到了缴费率的差异。中国的缴费率，虽然中央政府有一个基准的缴费率，比如养老保险，企业要交20%，医疗保险，企业要交6%，加起来是26%，但是地区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我们根据地区间的差异，选了4个省，因为只有这4个省的差异比较明显，其他的地区基本是按照国家的基准缴费率来的。按照这4个省，可以分出高缴费率地区、中等缴费率地区和低缴费率地区，我们用这个差异来看一下不同企业的参与程度。我们用的数据是现在广为使用的工业企业普查数据，这4个省的制造业共有两位数行业的制造业，2005年有10万多家，2007年有13万多家。首先我们看有多少企业是缴费的，有些企业根本就不缴费，还有是缴费的企业的实际缴费率是多少。因为不同的政策缴费率对比实际的可能不可比，我们再用政策缴费率标准化一下，相当于你偏离本地政策缴费率的程度是多少。我们发现，跟文献里一样的是国有企业会更加遵守，但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低缴费率地区的参与程度明显高于高缴费率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参与社会保险是有成本跟收益的权衡的，当缴费率逐步提高的时候，事实上参与这个体系的成本开始逐渐会超过收益，因而参与激励也会下降。我们根据前面这些回归，做了一个模拟，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观察到也好，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最优的缴费率，使企业有最高的积极性参加，实际

缴费率最高。所以我们提出，中国目前大多数制造业是不得不考虑劳动成本的，你要让它覆盖更多的人，这时候是要把缴费率下降的，降下来之后，收到的实际缴费率是高的，收到的钱不会比以前少，你不用担心在老龄化的背景下还降低缴费率，难道不会雪上加霜吗？实际上恐怕不是的。所以我们提出一定要把缴费率降下来，尤其是在高缴费率地区一定要降下来，至少不能再涨了。另外，其实我们还是有空间的，当你把缴费率降下来之后，未来的养老待遇肯定也要相应下降，这也是大势所趋的。养老待遇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是可能要延长退休年龄，蔡昉老师也说，60岁以上的那些人的人力资本已经不足以让他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工作了，当然这个退休政策的延长可能不是明年一下子就延长5年，它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二三十年的过程才延长5岁。我想提出的是，延长退休年龄会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挤占年轻人就业呢？看一下北欧的例子，北欧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只有30%，但现在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大概是70%-80%，在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的过程中，你没有看到男性大规模失业。这就说明，事实上有某种因素会影响到挤出效应。中国未来养老金改革离不开蔡昉老师说的经济增长，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养老金改革的最后的出路不在于养老体系本身，而在于整个经济的健康成长。

谢谢。

主持人：感谢两位女士非常好的研究，非常简洁的表达，她们严格遵守了时间，同时把最重要的信息也传递给了大家，比如她们强烈建议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一些制度、政策的安排，比如我们要降低缴费率，才会让整个金额的池子更大。同时她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养老的这些政策安排、制度安排对于收入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整体公平应该是怎样的，从中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为我们的政策提供未来的改革空间。

下面讨论的重点是金融应该怎么改革。金融改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假说，这个假说是基于蔡老师给我们奠定的整体框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从2010年下一个台阶必须可能要继续下，蔡老师提出我们能不能提高TFP，？

? 有可能没有是通过非常深刻的金融改革，我们通过种种方式，最后提高了TFP，也提高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最后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再上来一点，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还是金融压抑。

下面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力平教授，也是中国经济学非常重要的一位研究者。

贺力平：谢谢，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特别要祝贺胡永泰教授和复旦大学团队成功地主编这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部著作，我也很高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一个小小的部分的写作。

听了很多专家关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言，我也得到很多启发和体会。就金融部门对经济发展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我想借鉴胡教授引用的托尔斯泰的话来说，我们说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可以比喻为小说的主人公是非常美丽和重要，同时又是多么的脆弱和多变。

具体来说它的作用，我想到四点：一、金融体系在一个正常的发展中不能破产、不能崩溃，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遭遇到巨大的打击。当然也不是说不允许一个健康的人生病，如果你不让他生病，不让他有缺点，这个人也可能患上抑郁症，他就失去活力。二、金融部门正常发挥功能，必须要源源不断地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提供资金的支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只是一个静态的问题。三、金融部门必须以创新的方式向社会经济当中那些有活力、创新的企业提供资金的支持。这方面我们可能会提出想到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有远见的资本市场，它可以比传统的银行、信贷部门更能去捕捉社会经济活动中那些创新性的活动。四、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部门必须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那些薄弱群体和地区提供支持，防止社会各个阶层出现分化，比如我们要为贫穷的减贫，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基本的金融服务。

最后，我从蔡昉教授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封进和何立新教授提到的养老结构的变化想到，现在中国社会面临老龄化、灰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部门必须要发挥有效促进收入财富和储蓄的代际转移的作用，防止养老金危机。因为养老金危机一旦发生，我们会看到，不仅是在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在我们这儿，我们可能以后会占领上海金融中心、占领上海陆家嘴，这就是一个代际危机，这些都跟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关。

还有三个特别的试点。第一个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追赶没有完全成功的试点，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它达到美国人均 GDP 的比例的高点，在 70% 左右，然后就开始不再上升了，现在只有 60% 多。第二个是阿根廷，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它已经达到美国水平的 80%，可是此后一直下降，现在只有 30% 左右。第三个是马来西亚，最高的时候，它也曾接近美国水平的 50%，但在后来这 10 年当中基本上没有显著上升。

这三个试点中，都和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或多或少有关系，关于日本，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比如它的主银行制度，使得银行和企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对新兴的、创新活动的支持是非常不足的。在 90 年代以前，它的金融体系在客观上助长了经济泡沫地产价格的飘升，影响了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它过度依赖海外资本市场，形成中介化。

我对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和经济情况了解不多，但有两个事情可以提到。对阿根廷来讲，我们知道它有一个传统，就是外贸非常发达，大型金融机构一直在做贸易融资活动，很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忽略了对国内工业的支持，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群体和地区的金融支持。2001 年，阿根廷还爆发了比较严重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它的复苏是相对缓慢的。

对马来西亚而言，我也是很了解当地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在 1998 年整个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马来西亚是率先推出资本管制措施的，而且至今还存在。我相信，既然它的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措施来保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也使当地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抑郁症”，活力不足。

中国是特别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可能的威胁，我们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都很赞同。在金融部门方面，要做哪些努力呢？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十二五”金融规划，这个规划的总体原则和布局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简单概述其中四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我们要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化，前面有人提到我们要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使金融资产的价格更能反映社会的需求和供给以及更有效引导金融资源的配置。

同时，我们要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使它更有弹性，更能反映内外经济的平衡，促使中国经济再平衡。

我们还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单纯依靠银行的信贷，我们势必会丧失对经济当中那些最有创造力的企业活动的支持，这主要是要依靠资本市场。

第二，我们必须要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要让它在机构的不同设置上，不管是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微型的，都要有发展，我们中国经济本身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复杂多样的不同地区、部门、人群，我们一定要有金融机构的多样化。

第三，我们必须要推进现行主导型的金融机构的制度、组织层面的改革，即治理结构改革，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国有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行政与企业不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党政不分的旧有制度，我们要加强治理结构的改革，使之真正朝着现代企业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的方向来努力。

第四，我们要加强、改善金融监管。在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多样化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很多金融风险，必须要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存款保险体制这样的新的机制。同时，金融机构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构，还要真正有一批具有专业尽职精神的监管人才。

我认为这些代表了我们金融机构、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新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社会各个方面平衡地发展做出贡献，从而有效地避免我们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主持人提出金融部门怎么提高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我认为这可能会比较难，应该还是靠实体经济部门发挥主导作用，金融部门应该是发挥不妨碍的作用。

谢谢。

主持人：谢谢贺老师否定了我的假说，可见他对金融业的热爱，他觉得金融业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她非常美丽，同时非常脆弱，给她的要求不能太高。但确实贺老师给我们指出了中国未来金融改革比较重要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也确实将决定中国金融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决定中国整个经济的未来。

下面进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主题，关于财政。很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财政是下一阶段改革中最核心的话题，我们要请出来自复旦大学的另外一位才女——张晏教授给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角度来讲中国下一阶段的财政改革。

张晏：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这里介绍我们在胡老师主编的这本书中有关央地财政关系的研究。

如果考虑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从 1978 年以来的增长历程。我们会把 1980 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改革看作是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事件。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也被认为是扩展了下一步基于县域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一个财政改革的事件。到今天这个时点，分税制改革在央地关系之间的各种弊端也逐步体现。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央地财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下一步的推手呢？

我们可以把地方债务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到 2010 年底关于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引发的 10.72 万亿地方债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今年初开始了新一轮的隐性增长。我们要讨论央地财政关系，可以把四万亿引发的新旧经济刺激政策下地方的隐性债务风险作为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的财政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比较一下 2008 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几个特点可以归纳一下：第一，它是政府的快速反应，世界罕见；第二，短时间内出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刺激，相当于 GDP 的 4% 的规模；第三，它把这样一个中央应该承担的宏观调控的职责下放给了地方，要求有近三万亿的资金由地方配套。

2012 年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一方面，不是像 2008 年一样是中央往下摊派，今年是地方自发的、有发展经济的冲动。第二是时间没有那么紧迫，有更长的时间做一些相对来说正确一点的选择。第三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给私有投资者。

比较 2012 年和 2008 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我们看到，投资风向没有大的变化，其次是在融资方式上，依旧是利用地方融资平台这样一个有很多弊端的方式；再次，同样非常激烈的地方竞争。

我们非常担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会有非常大的放大效应，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讨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时候必须回过头去看中国财政的体制背景。一方面，在财政和经济上我们是分权的，但是在政治体制上是集权的，这样地方各级官员为了晋升，有非常强烈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冲动。第二个重大的背景，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干预的比重是比较大的。这种背景为我们从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变成 10.72 万亿，甚至还有说法认为是 14 万亿的地方债务埋下了伏笔。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反过来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也会加剧地方对政府主导投资的依赖性。第三个重要的制度背景，贺老师提到，金融体系里和地方政府的连接并没有完全被切

断，虽然 94 年银行体系垂直管理，部分切断了地方政府对银行的直接控制，但是我们知道，总是有中央政府会援助地方政府的预期，所以对银行体系而言，它是非常乐于更多地贷款给国有企业，给以地方政府财力为担保的投资，实际上这是不利于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的建立的。

从这些意义来看，如果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理清在央地财政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些制度背景之外，我要去改进央地财政分权的事实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激励。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状况，可以看到，1994 年改革以来，2001 年，地方财政用了 46% 的钱承担了 80% 的支出责任。钱不够，有很多途径，一方面是土地财政收入，同时还有地方债的收入。土地财政和城市化结合起来以后，对于其他经济是有很重要的冲击的。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2002 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以后，转移支付给东部地区多的现象在逐步缓解。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近年来对应性的转移支付更多，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自主性其实是在下降的，地方自主性的下降可能导致的一个问题在于分权的积极效应无法发挥。但是上级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我把钱给你，不告诉你干什么的话，你可能都去做基础设施建设了，这也是我们需要权衡分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重构央地财政关系，要思考更深刻的是体制背景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三方面：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为谁做。

做什么？要考虑我们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做发展财政，还是更多的考虑科教文卫投资。怎么做？意味着我到底用什么钱来做，我是用自己的钱来做还是靠你能给我转移支付这种不稳定的预期下去做事情。为谁做？也就是谁来监督我的问题，是像以前一样对上负责还是我们可以有基层民主，比如在县级财政里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和其他行为更倾向于满足居民的偏好。这三个问题可能是更核心的问题。

讨论具体对策，我们也有一些研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前提的基础是要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讨论央地财政关系和整个财政体制如何架构的问题。以教育分权为例，因为 80% 多的责任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支出的责任不一定界定正确。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上，如果中央向地方分权的话，是会提高省级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的。如果是往省以下继续分权，是会降低初中毕业升学率的。在基础教育层面

上，集中到省这一层是很正确的选择。如果分城乡来考虑问题，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成果，如果考虑农村升学率提高的问题，中央向省分权也是一个负面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在具体的政府支出的类型上，可能要考虑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分权策略，比如义务教育，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省级集中的基础上，对于农村的义务教育要加强中央的直接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类似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推广到我们很多的公共服务民生财政方面的支出上。

还有一个研究可以看到，至少在 2005 年以前，中央和省的分权是会降低它在科教文卫上的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比例。今年温总理说我们的教育支出占 GDP4% 的比例是一定要达到的，但是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烈的诉求，他们认为有很多钱我们已经付了，已经算在中央财政里了，地方没有更多的钱，在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地方财政存在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教育支出占 GDP4% 的比例即使达到，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支出的效率就是高的，这是我们更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观察到一些省份采取的是给予农村免费师范生的政策，他们采用全省集中招标、集中安排，由省财政直接拨付资金。这样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上更借助于规模经济，便于其管理，弊端是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有一切积极性去发展这些民生财政的问题。

所以，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我们是要给地方政府足够的收入预期，我们在收入方面的分权也要进一步改变。如果是基于转移支付为基础的改革，一方面是有很多腐败，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可能会去“跑部要钱”，它的激励是完全错的。第三方面是我们也有研究发现，在早期针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结合以上考虑，我们的总的看法是，如果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财政体制还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在合理界定政府作用的基础上界定清楚中央、地方及省以下的权力，同时，一个良好的收入体系加以支撑，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民生财政的建设。

谢谢。

主持人：感谢张晏老师，她的时间控制比我们要求得更紧，给我们留了一些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还是希望增加互动。

提问：我想请问蔡老师两个关于人口红利的问题

第一，从近 5 年来看，从 2008 年来看，我国经济经历了两个谷底，一个是发生在 08 年 3、4 季度，还有一个发生在今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对 08 年 3、4 季度，媒体对于农民工失业的现象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今年这个报道的关注度并不高，这是不是和人口红利消失有关呢？

如果政府的经济刺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维持高就业率和经济稳定的话，在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经济下行一个周期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出现以后，对于就业率上升的组织效应的显现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有一个更低的容忍率？

第二，中国在上一阶段的经济成长中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和低融资成本。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在供求关系中的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抚养比上升，融资成本也上升，因为储蓄率下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或者说在未来全球平衡进程的角度看，中国过去的比较优势在于它有一个特定的要素就是融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很低。未来中国的国际分工比较成本优势何在？您能否描述一下在未来国际分工中，中国经济增长点何在？

蔡昉：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将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假设是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下的潜在增长率是下降了，比如比我们过去的预期下降了 3%。既然是充分就业，那就很自然，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政府的刺激，投资率还要下降一半，如果贡献率下降一半的话，没有出口需求，我们的需求因素也足够满足这个下降了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坚守这个增长速度，今年也确实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失业率是 4.1%，9 月份提前完成了新增就业 114%，岗位供求比大于 100，跟去年基本持平，这都证明了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它和我们“十一五”、“十二五”的计划预期以及今年定的 7.5% 相吻合。

第二个问题，如果从表面现象看，当然一个国家的劳动作为优势资源消失的情况下，应该会逐渐从劳动力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没有了，但我们只是这样说，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传统的人口红利。比如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又推进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很自然，过去打工的那些人到 40 岁退休了，

但现在他们可以不退休，在家门口可以找到过去干的工作，因此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明显提高了。我的同事也做了测算，如果今后 10 年，每年在劳动参与率上加 1% 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在整个这 10 年的潜在增长率是可以增加接近 1%。也就是说，人口红利的确是有潜力可以挖的，当然我们还有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等很多因素。

因此我觉得，第一，我们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国，还会维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的规模太大了，所有想承接中国产业的国家，都尽管接，接了以后也不会把我们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削弱太多，可能中西部地区会起更重要的作用。第二，我其实不愿意描绘这个情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在这上面弄糊涂了，说我们要产业升级迭代，要寻找动态的比较优势，最后就变成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用资本密集型产业替代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最后的结果，举个例子，日本在 1990 年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很自然，劳动力很紧张，他们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保证经济增长，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条直接看到的，企业也容易看到、政府也容易看到，就是提高资本劳动比。日本 90 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率 94% 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提高也有一定的贡献。接下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 15%，像日本这样的成熟经济，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就没有增长率，因此陷入 0 增长也是必然的。所以，为了避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描述这个，我们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是从提高生产率，特别是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去获得。

主持人：感谢蔡老师全面的回答，我总感觉蔡老师的心中有无数的宝藏，你提出一个问题，他就掏出一个宝藏，你再提出一个问题，他还能再抛出一个宝藏。还有没有问题？

提问：我来自北大，是研究宪法学的。请问蔡老师，我知道，现在人口政策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从方法论的视角来探讨的话，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来更好地处理您刚才讲到人口红利以及老龄化，现在很多城市提出“幸福城市”，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更健康、更和谐地发展。您怎么看？

蔡昉：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回答，你说的我赞成。就是说，我们以人为本、取信于民，我们的人口政策终究是要调整的，也到了这个时候。30 年前中央就说过这层意思，说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政策要调整，“十二五”规划里也确定了要

完善政策，内涵就是要进行渐进性的改革。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调整了人口政策也不会改进中国老龄化的进程，也不会改进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在我们可见的时间里，也不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什么积极的贡献。

主持人：王丰老师有不同意见吗？

王丰：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很好地利用。

我想给蔡老师做一个广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的中国发展报告就是讲人口和人口政策的改变，这个报告的主笔是蔡昉老师和南开大学的李建明（音）老师，上周刚开了发布会，这个报告很快会面世，这是目前为止政府最接近的、级别最高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报告，国际上的记者也已经做了报道。

主持人：您认为这个报道走得够远吗？

王丰：这个报告走得够远。当时我给改革基金会的秘书长发了一个回应，这个政策讲生育归民，要把生育权归到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口号很大胆，但下面有一句话“提倡节制”，我觉得很迷惑。下面的话就不说了。

主持人：这说明王老师还是有很多话要讲，这次会议上我们就不说了，以后再讲。

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五位老师精彩的发言，最后一个环节是来自复旦大学的陆铭教授作一个总结。一般来说这个环节是最难的，但是因为陆铭是代表了复旦的口才水平，我们对他非常有信心，有请陆铭教授。

陆铭：首先我是要感谢，感谢所有的人，首先是胡老师、蔡老师、贺老师、王老师，我们复旦的团队和BM的团队。

我把感谢的话讲到最短，我讲四个意思。

第一，中国的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在政策研究中充分重视空间的力量。今年也恰好是马歇尔以来现代经济学产生大概1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能都已经忘了这个日子。中国在喜迎十八大的时候，应该充分重视在过去100年里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在我看来，在过去100年里面，经济学最伟大的革命不是凯恩斯革命，而是两点：第一，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使得经济学的模型变成动态的模

型。这个方法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资源在现在和未来如何配置，如何使得经济增长处在最优的路径上，它对我们当前的启示就是，如果我们一味靠投资总量的增长，如果我们一定是靠数量的增长的话，它的边际回报是下降的。于是在动态的路径上，我们很有可能并不是在一个最好的路径上，因为你如果没有回报的话，投资是要下降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政策更要去借鉴的是空间因素的引入，我认为这是过去 20 年以来经济学最大的革命，就是看到经济的发展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今天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中存在着很多非市场因素，其实都很没有充分重视空间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有关，比如前面讨论中已经讲到，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阻碍劳动力流动，我们的土地制度在限制土地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其实你真往下问一句，我们的利率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也跟空间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低利率在保护投资的时候保护的更多是那些投资效率低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效率低的投资就表现在国有部门推动的投资以及在地理劣势地区的投资。

其实前面有学者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增长要促进 TFP，我认为 TFP 的来源就在于刚才讲的道理里。第一，通过控制投资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来提高投资的效率，特别是由国有政府所推动的投资，效率有待改进。第二个 TFP 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生产要素在空间的再配置，是中国下一轮改革中 TFP 非常重要的来源。今天在喜迎十八大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讨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第二，如果我们忽略前面讲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中国今天要谨防欧洲化的危险。在经济界、政策界讲的比较多的是中国要谨防拉美化，我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危险，比拉美化更加严重的是欧洲化。今天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经济宏观一放松，利润一调低，货币财政一低，地方政府马上有非常强烈的融资冲动，刚才张晏已经讲到，地方版的四亿计划正在今年普遍推出，连贵州这样的省都要去搞工业强省计划，这里有多少低效率，大家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经济一紧缩，中国的内地省份就会变成希腊，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的低效率马上会转变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而这和现在欧洲所出现的财政危机、政府债务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扩张和融资的冲动，一旦当经济紧缩，首先出问题的就是在欠发达地区和劳动力市场比较低的地方，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天非常沾沾自喜的是我们不怕，因为我

们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对了，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从发达地区、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收来的税补贴欠发达地区，把它的债务化解掉，但是长此以往所积累的地区间的矛盾怎么办？现在很多发达地区的老百姓和政府的思维方式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担心他们来分享我们的公共服务。但是我们再往下深挖一步的话，你今天不让这个劳动力在地区间充分流动，最后由于我刚讲的流动，由于他们人没流过来，你就不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有投资，而投资会转化为低效率，而债务危机的时候你还要用从发达地区收来的钱去补贴欠发达地区，你承担的损失是一样的，只不过机制是普通老百姓看不见的。

第三，今天中国一定要有这样非常强的声音，我们这本书里也在传递这样的讯号，就是我们的改革需要呼唤公共利益。我前面讲到的生产要素在地区间配置的障碍都跟今天中国已经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政治经济学的局面有关系，而这个政治经济学就是每个地方都在考虑我的利益。这样导致的局面就是每个地方都分割市场，大家都想要更多的土地，但是不想要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低端的劳动力。在这样的格局下所演化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欧洲化的风险。中国会将因为地方的市场分割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而使得中国就像一个实际上的欧盟。今天如果再不提出要地区和地区之间坐下来去考虑如何中国市场的统一和生产要素再配置，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应就没有了，我们的“中等收入陷阱”真的是指日可待。

第四，解决所有的问题，就五个字：市场化改革。今天前面有听众问到许小年教授，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制度变化的动力在哪里。我觉得今天许教授的回答有点闪烁其辞，我就要讲，喜迎十八大，大家期望很高，没有什么可避讳的。改革的动力就两条：第一条，由低效率所导致的经济持续下滑所带来的结果，你不得不面对，否则大家就像一艘船一样，一下子沉下去。第二条，跟经济增长的下滑也有关系，就是在当前的扭曲和各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不公正之下所导致的我们对于不公平的体会，比如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社会保障方面有体现，在城乡分割和区域间分割里也有体现。这种不公正给我们带来的不满意感也会通过社会的不满意而使得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希望接下来的改革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来完成的，而不是以自下而上的动荡来推进的。

我许诺杨燕青，我今天所讲的跟在复旦大学的发布讲的不一样，我做到了。但我还忍不住讲一句在复旦我讲过的话，就是我引用了丘吉尔的演讲，这个演讲就两个字：never give up。

主持人：非常感谢陆铭非常精彩的结言，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我们最后只总结五个字，我们要喜迎十八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都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而且也一定会改革。

再次感谢第一节讨论的嘉宾，他们有些还在台下就坐，再次感谢第二节讨论的嘉宾，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坚持到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感谢王丰老师、周雪莲女士和王梦妮女士，他们非常辛苦地策划和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最后还要感谢我们的总设计师胡永泰老师。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清华再见，谢谢。